

自序

进入 1990 年代,我逐渐走出纯粹的文学研究,兼治学术史与教育史。《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以及《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的出版,既赢得许多读者,也遭受不少非议;这更激发起我对“大学”话题的强烈兴趣。此后陆续出版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等,也都涉及百年中国的大学教育。以至在一次相当严肃的史学研讨会上,竟被主持人作为“大学史专家”介绍。

“文学史”与“大学史”,虽仅有一字之差,其间讨论对象、研究方法以及问题意识等,均有很大距离;没有受过严格的教育学训练,实不敢妄自称雄。之所以斗胆闯入邻居神秘幽深的“后花园”,还自得其乐地“吟风弄月”,不外坚信风云激荡的思潮,必须落实为平淡无奇的体制,方能真正“开花”、“结果”——学术思想的演进以及文学艺术的承传,其实与教育体制密不可分。这一点,在收入本书的《新教育与新文学》,以及最近发表的《“文学”如何“教育”》中^①,得到

^① 拙文《“文学”如何“教育”》刊于《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随后,陈思和发表《既是“知识”,也是“审美”》(刊《文汇报》2002年5月4日),孙惠柱发表《也谈文学如何教育》(刊《文汇报》2002年5月26日),对拙文观点有所呼应与发挥。

某种程度的阐发。

我曾经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①至于我自己，不过是在努力实践这一预言。

书中各文，最早的完成于 1996 年 10 月，最晚的则撰写于 2002 年 4 月。但追溯我对“大学”话题的兴趣，还得从 1994 年春天的一则随笔说起。那时我正在东京大学访学，阅读了若干“东京大学百年”之类的著述，大有感触，于是遥想北大百年，很可能会成为反省中国高等教育的绝好时机：

相对来说，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政治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撰写“百年史”所面临的困难，肯定比东大要大得多。倘若少点道德意识，多点实录精神；少点个人色彩，多点历史进程，或许能避开一些无谓的纷争。^②

事后证明，尽管我的预测颇为悲观，还是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无谓的纷争”纷至沓来，大大影响了我研究的进度与心境。虽说因谈论北大传统与大学精神招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有心人居然将区区小文与虚拟的“资本主义在

① 陈平原：《辞“校史专家”说》，《新民晚报》1998 年 5 月 10 日。

② 陈平原：《大学百年》，《文汇报读书周报》1994 年 10 月 29 日。

中国复辟”这样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①；好在今非昔比，不至于被人一棍子打死，故还敢于坚持己见。

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学术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此书实践此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

本书以问题为中心，故搁置诸如“20 世纪中国大学史”这样的宏大叙事，只是就自己熟悉且感兴趣的话题，稍做深入开掘。本书谈论的大学不过七八所，且重点落在我目前工作的北大，很容易给人“自我贴金”的感觉。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以北大为主要个案，讨论中国大学百年的经验教训，很大原因是北大地位特殊——谈论 20 世纪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北大实在无法也不应该被轻易绕开。除北大外，我还关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无锡国专——如此名单，一看就是“别有幽怀”。并非专业的教育史家，我之谈论大学，不太涉及办学规模、经费预算以及综合实力评估，而是注重其个性与风采。选择的标准是，“校史”之外，必须有值得咀嚼的“故事”与“精神”。

^① 参见拙著《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一书的《后记》；至于精彩纷呈的“后续故事”，留待日后作为调节气氛的“豆棚闲话”。

谈论百年中国大学史,我自认为游刃有余的,还是北京大学。“近水楼台先得月”,对这所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我了解较多,体会也较深;另外,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老北大的传统。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传媒的过分热情,以及校方的某些举措,激起了学界一些朋友的不满,导致其较多发掘北大本就存在的消极面,甚至转而热讽冷嘲。私心以为,北大作为中国教育史乃至思想史的重大话题,其功绩不能轻易抹杀,其过失也必须认真对待;只是不管说好说坏,都必须出于公心。作为北大人,我之直面乃至褒贬北大,其实很不容易——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一片责骂声。

我谈老北大的文章很多,至于提及新北大的,当以《北大人的精气神儿》最有名。此文乃应“北大在线”之邀而作,颇有“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意味,故更应该格外讲究分寸,否则,很容易让人反感:

比起波光潋滟的未名湖、古朴庄严的博雅塔,以及近年崛起的百年纪念讲堂和理科楼群等有形景观,我更看好北大人的自尊与自信。踏进燕园,你很容易为这种有历史感因而显得深沉、有现实关怀因而显得生动的“少年气象”所感动。更为难得的是,这种“少年气象”,既属于稚气未脱的本科生,也属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生活在如此气韵生动的校园文化中,你不会因此而摆脱人生的众多困惑,却很可能平添一股肉搏这虚空与烦恼的精气神儿——这正是北大真正诱惑人的地方。^①

以上这段话,扪心自问,没有刻意拔高;而且,可以说是抓住

了北大的灵魂。

谈论一所大学的“光荣与梦想”，与品鉴校园里具体人物的得失，完全是两回事。背靠一流大学，确实能使三流学者陡增自信，人前人后显得底气十足；但真正一流的学者，反而不太在乎自己所在大学的排名前后。学者与大学的关系，就好像商品和橱窗，有相得益彰的，也有一方过分依赖另一方的。在我看来，生活在北大这样的名校里，最应该反省的，应该是“名至而实不归”：

记得张爱玲说过，香港是个夸张的地方，在那里摔一跤，比在别的地方摔的都疼。北大也是如此。在这里，出名容易，失名也不难，而且速度都很快。在北大的“言说”（正反不论），容易引起学界的关注；再加上川流不息的进修与访学，实际上起了放大器的作用。一般说来，这种状态，对北大人有利；因为，不用花特别大的力气，就可以引领风骚。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正因为太容易得名，北大人必须时刻警惕名至而实不归的危险；也正因为可能领导潮流，过度热心于此，难免为潮流所裹挟。^①

在这个意义上，热闹得有点夸张的北大校园，不见得就一定是读书的好地方。

在《中国大学百年》以及《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中，我对20世纪中国教育之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赏，但对其抛弃悠久的书院传统则十分遗憾。讨论此问题，我还撰有《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因使

① 《从中大到北大》，香港：《纯文学》复刊3期，1998年7月。

用的资料与前两文略有重复,没有收入本书。但那篇文章的结语部分谈论“书院在 21 世纪”,有几段话值得引录:

谈论本世纪书院精神之不绝如缕,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至于某些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借鉴书院教学,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①

了解我对中国书院传统失落的深深感慨,当能明白为什么我对“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这样的命题^②,以及对南开大学、无锡国专这样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格外感兴趣。

① 《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香港:《岭南学报》新 1 期,1999 年 10 月。

② 拙文《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初刊《学人》第二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后收入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和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

本书谈论中山大学那一篇,以《不该消逝的校园风景》为题,其中隐含一个假设,即有“雅事”与“隽语”支撑的老教授,乃是校园里绝好的风景。这其实是延续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的一则短文的思路。在那则怀念师长兼自我反省的《即将消逝的风景》中,有这么几段:

记得刚进北大时,在未名湖边留连,学长指着日后逐渐熟悉的老教授的身影告知,此乃燕园里最为“亮丽”的风景。如今,秋风凋碧树,风景日渐暗淡。常听人感叹“江山依旧,物是人非”;其实,既然哲人已逝,“江山”就不可能真的“依旧”。

还会有博学之士入主燕园,但不见得“有韵”且“有味”。作为“阅读对象”的学人,知识渊博固然重要,更值得欣赏的,却是其个性、气质与才情。慨叹老一辈学人多逸事,后来者因长期压抑,有趣的人不太多。当然,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因素,使得北大校园里这道特殊的风景,有可能永远消逝:一刀切的退休制度,使得以后的学子,再也没有六十三岁以上的老教授可以“从游”;校园里人满为患,新人早已撤到燕北园、西三旗去了,若干年后,未名湖边,再也见不到悠哉游哉的老教授。

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单就“授业”而言,所谓“青黄不接”,大概属于危言耸听。不过,学生阅读的不只是“书本”,更包括“导师”。而我们这一代教授,是否经得住学生们挑剔的目光,是否还能为学生提供精神的乃至审美的享受,实在没

有把握。^①

如果注意到我对梁启超、梁漱溟、梅贻琦等人教育理念的表彰,以及对于“校园里的真精神”的阐发,当能明白“风景”云云,并非文学家的想入非非。

明知“说了等于没说”,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持之以恒地关注大学的命运,正应了那句老话:“位卑未敢忘忧国”。只可惜学识浅,撰述无多,勉强选出来的,也就这薄薄一册。

所选十则关于大学的文章,《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和《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三篇,是这两年新撰的,从未入集;其余七文,分别选自我已刊的五书。至于略为分隔,上编论文,下编随笔,目的是区别体例:论文用底注,尽量详细,便于研究者复核;随笔则文中夹注(夹注中的篇目,除特别注明者,均见所序或所评之书),以不妨碍阅读为原则。

本书的写作,得到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2002年6月30日于京北西三旗

^① 《即将消逝的风景》,刊《中华散文》1998年5期,同时收入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的《青春北大》。

目 录

自序	1
1 中国大学百年？	1
2 “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	39
附录一：“教育迷”的追慕	52
3 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	55
——民国年间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	
4 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	69
——以无锡国专为中心	
5 新教育与新文学	101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6 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	135
——1922 年的“风景”	
7 校园里的真精神	185
——《北大旧事》序	
8 不该消失的校园风景	219
——《走近中大》序	
9 教育史上的奇迹	231
——阅读南开	

10 过去的大学	241
——怀想西南联大	
附录二：吴宏聪先生的《向母校告别》及相关照片	248
附录三：向母校告别(吴宏聪)	253

中国大学百年？

1

文章的题目,是从两本英文书借来的:一是《中国与教会大学,1850—1950》(*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一是《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世纪的文化冲突》(*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二者都以“百年”为叙事框架,而且都有相当充分的论证。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方才开始进行高等教育,杰西·格·卢茨的从1850年说起,只能理解为“寻根溯源”^①。考虑到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五十年代以后一概消亡,用“百年史”来涵盖,倒也未尝不可。谈论“中国大学”,可就没有那么确凿无疑了。加上一个问号,就因为 Ruth Hayhoe 的思路,与中国的教育史家大相径庭。在找到准确的答案之前,只好依古训,“多闻阙疑”。

到底是“中国大学百年”,还是“中国大学四千年”,不只牵涉史家的叙述框架,更与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息息相关。

到底是“中国大学百年”,还是“中国大学四千年”,不只牵涉史家的叙述框架,更与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息息相关,故需要认真辨析。为大学“正名”,并非本文的主要目的;借助晚清以降教育革新历程的梳理,讨论大学的功用,展现其可能出现的前景,方才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不过,话还是得从头说起。

一、两种大学史

将教育史的写作,作为一种叙事来理解, Hayhoe 的著作,

^① 参看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第69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事业》第57页,台北:津出版社,1991年。

以“讲述故事的概念与框架”开篇,接下来的章节,依次是“国民政府的故事,1911—1949”、“社会主义的故事,1949—1978”、“改革时代的故事,1978—1990”、“从中南区透视”、“从西北区透视”、“成人高教与中国的大学”。并非教育史家的我,最为关注的,自然是其叙事框架。在第一章中,作者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中国的学术体制与价值;东方

岳麓书院

传统和范型;欧洲大学的凯旋^①。在这个叙事框架中,“中国大学”属于西学东渐的产物,当然只有“百年史”。

可是,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叙事,那便是:中国大学的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千年”。以我阅读过的著作为例,伍振 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

^① *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pp. 3—23,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6.

史》、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以及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都是论述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①。教育史家毛礼锐为熊著作序，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并批评以往将创立于十一世纪末、有1万2千学生的意大利的波伦亚(Bologna)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大学。在毛氏看来，中国的大学，或从殷周算起，或从战国算起，退一万步，“如果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那么我国在公元前124年便无可置疑地有了较为正式的大学”^②。上述四部著作，胆子大的，开门见山，第一章便是“夏、商、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曲著)；谨慎一些的，书名叫“高等教育”，但也忍不住断言，“我国的大学教育起源于商代是毫无疑义的”(熊著)。理由是，《礼记·王制》有言：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类似的零星材料，还能找到一些，但不会太多。因而，复原西周的大学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三代之学”作为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记忆，确实影响了整部中国教育史的建构。除非否认晚清以前存在着“高等教育”，否则，无法不从西周说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确实有三四千年高等教育的历史。

① 伍振：《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台北：三民书局，1982年；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高奇：《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② 参见教育史家毛礼锐为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所撰的序言。

可是,这么一来,很容易导致“大学”概念的瓦解——任何一个文明,必然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谓“大学”的起源,岂不成了“伪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翻译上,当中国人以汉语的“大学”,对应英文的“University”时,必须警惕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乃至发展方向,均与其历史渊源紧密相关。西方人谈“University”,一般从中世纪说起;至于古希腊,只是作为思想渊源来追溯^①。同样道理,谈论中国的 University,似乎也不好意思追溯到西周。

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乃至发展方向,均与其历史渊源紧密相关。

突发奇想,上述四种教育史著,都没有英文书目;假如需要,怎么翻译? The History of China's University,肯定不合适,恐怕只能勉强译成 The History of China's Taixue and University。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教育史家囿于“大学”的名义,将其合二为一,便出现了许多问题。

还是辞书学界严谨,两种不同渊源的大学,分得一清二楚。“大学”一词,在《辞源》中是“古代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即太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则是“实施高等

① 之所以称大学为“独特的中世纪机构”,就因为,“在中世纪,它的发展具有当今流行的许多特征,如名称、中心地,具有一定自治权的教师、学生、教学体制、考试及取得学位的程序,甚至拥有自己各学科的行政管理机构”(克拉克 克尔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第6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在我国一般指综合大学”。前者念 *tai xue*,后者念 *da xue*,即便是读音,也都泾渭分明。《汉语大词典》兼及二者,既讲实施现代高等教育的 *da xue*,也讲包括周之辟雍、汉以后的太学以及晋以后的国子学的 *tai xue*。依此类推,*tai xue* 史只能讲到晚清;*da xue* 史则只有百年。硬要谈论从古到今的“中国大学”,恐怕很难得其要领。

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之所以长期不被学界正视,就因为涉及所谓的“民族自尊”:一个文化古国,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与此相类似的,是具体大学的溯源。冯友兰先生称,“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理由是:

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①

尽管有种种遗憾,北大校史始终以戊戌维新为起点。倒是前几年湖南大学力争从岳麓书院(976)说起,这一“悲壮的努力”,最终被国家教委否决。否则,中国将出现一大批远比巴黎(1170)、剑桥(1209)、哈佛(1636)、耶鲁(1701)古老得多的“大学”。

这种建构“悠久历史”的冲动,从1920年代便已开始。

其实,这种建构“悠久历史”的冲动,从1920年代便已开始。先是柳诒徵撰写《南朝太学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称“金陵之有国学,自孙吴始,晋、宋、齐、梁、陈,迭

① 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有兴废”；“明之南京国子监，实为上下千年惟一之国立大学”。柳氏基本上严守史家立场，承认：

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遂无寸瓦尺椽之遗迹，可以供今人之印证，仅能从史志之文，想像盛时之状况矣。^①

之所以着力钩沉史料，就因为古之太学，“虽所业与今殊科，其劝学之方，析理之式，固皆足为诵法，恶可任其湮郁史册而不章哉”^②。

到了张其昀，可就不一样了，目的很明确：为中央大学建构优良传统。其所撰《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1935），称中央大学及其前身东南大学、两江师范，都在南京城北钦天山前，此地乃五百年前明代大学之遗址。于是，穿越时空，扶摇直上：

追溯其源，则刘宋之四学，萧梁之五馆，均在钦天山麓，薪火之传几至千五百年。中国各大学论其历史关系之深，精神遗产之厚，举无有能及中央大学者也。^③

如此勇敢的溯源，“中国各大学”确实难以匹敌。但此风不可长，否则，中国教育史将是一笔糊涂账。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地域文化之多姿多彩，随便一考，哪一所大学都能长出千八百岁。校史的无限扩张，之所以不值得提倡，除了有违实事求是原则，更因其遮蔽了“大学”与“Uni-

① 《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柳诒徵史学论文续编》第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② 《南朝太学考》，《柳诒徵史学论文续编》第442页。

③ 张其昀：《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中国历代大学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8年。